

德法相依思想与措施

德法相依是我国古代国家治理的主要思想和方针。商周尚无制度法，礼是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被作为规范贵族等级和国家秩序的制度，其基本精神是“亲亲”“尊尊”，即按照宗法关系别尊卑、序贵贱。“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反映礼是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工具。礼的治理思想与实践，是与商周“封邦建国”宗法血缘等级分封政体相适应的。

春秋战国时期，争霸与强国成为时代主题，礼已不适应新形将变化下的国家治理体系需要。各国先后公布成文法，以法取代礼。以秦国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采法家“霸道”之策，翦灭六国，取得巨大成功。但秦王朝“马上”得天下又“马上”治天下，秦的速亡引起了汉初统治集团的反思。从新的出土文献来看，汉初虽然直接继承了秦的许多法律制度，但为政的指导思想已经有重大调整。经贾谊、陆贾特别是董仲舒等人的推动，“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德法相依治理思想应运而生，构成服务于封建大一统国家治理的重要思想。

我国历史上德法相依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律令制定。“法治”一词及思想在我国起源甚早，是大一统国家治理的重要理念。这一理念强调法的共守性，主张“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强调法的规范性，提出“任法而不任智”“任公而而不任私”；强调法在治国安民中的重要性，认为“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历代统治阶级虽强调“德”，但从没放弃过法的作用。

“法”通过律令表现出来。统一后的秦王朝制定了大量律令，在国家治理上的作用远超过我们过去的认识。汉初的法律也远比我们过去想象的复杂。自秦至清，历代王朝都制定了颇为严密细致的律令，前后相续，涉及国家治理的众多方面。其中汉武帝以后开始的法律儒家化是显著特色，“儒家化”即“援礼入法”，将儒家的伦常理念，引入立法、司法实践，构成“德主刑辅”的特色。其目的是维护封建秩序的多方面需要，具有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

慎用刑罚。“明德慎罚”渊源于古



德法相依 华夷一家

——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三）

□卜宪群

老的西周。封建统治阶级也继承这一思想，某些时期贯彻在立法、司法过程中，体现出德法相依的色彩。自秦汉后，形成了司法中的“奏谳”“请谳”“会谳”制度；“谳”意为审判，对不能断定的疑难案件要逐级上报直至中央会审，也形成了“乞鞫”（上诉）、“录囚”（巡视监狱）、“罪疑从轻”等法律思想与措施。“死不可复生”“人命至重”“无冤死之鬼”等认识，使我国历史上自三国以后对一般意义上的死刑判决尤为慎重，形成上报和多次上报审核制度。

审慎性、程序性和复核权限的集权性是慎刑的反映，但在具体执行中，这种审慎性和程序性也经常受到干扰和破坏。历史上各种残暴的严刑酷刑，体现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本质。

权力制衡。我国历史上的法治思想中有权力制衡的内容，与近代西方的分权制有重大区别，体现出中国特色。主要反映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君权的制衡。秦汉后，不仅延续了先秦为君主设师、傅的制度，用儒家伦理教育从思想上约束君权，也在中央设有制约君权作用的行政中枢、谏议、封驳等机构或职官；中央决策中，有廷议、廷推、廷鞠制度。各项重要事务、案件的处理，呈现出一定的“集议”特色，构成制衡君权的某种制度程序。二是中央对地方的权力制衡。秦以后，我国基本是单一制国家，地方权力集中于中央，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命，既职责明确，考核严格，又实行行政、军事与监察三者分离，以制衡地方官吏权力扩张；以不断增加行政层级的形式，遏止地方权

重倾向。三是官僚权力的制衡。“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思想家强调“分职”在权力制约上的作用。自秦汉开始，从中央到地方，在各级官吏的权力划分上，在钱财物权及日常行为的管理、行政问责、复核审核、考核、监督检查上，规范日益细密，以防止权力滥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权钱交易、贪污贿赂、用人不公、贪婪奢靡、正气不张为特征的腐败现象在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以监督检查为核心反腐倡廉，成为制衡、制约官僚权力的重要内容。

我国历史上以权力制衡推动国家治理的思想与措施有利有弊。君权的制衡从总体上看是积极的，但皇权的至高无上，又使这种制衡时常显得苍白无力，彰显出突出的“人治”色彩；中央对地方的权力制衡总体也形成了，但某些时期单纯从“术”的角度强调制衡，特别是行政层级不断增多，又形成了叠床架屋的弊端；高度集权使政令得以统一，但各级官吏唯命是从、唯上是从、钩心斗角、朋党横行，又显示出消极弊端。

礼乐教化。我国自西周开始，确立了政治系统中的礼乐制度传统，并被历代统治者视为文化传承与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除《周礼》的整体性设计外，历代正史中的《礼乐志》及专门性的礼书编纂很多，体现国家对礼乐的高度重视。冉有曾经问孔子：民众“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回答：“教之。”《论语》中还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论述。自汉代开始，思想家、政治家从秦亡

的教训中认识到，礼乐教化与法同等重要，从而将经过改造后的儒家思想树立为正统意识形态，将“三纲五常”作为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并与蒙学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选举考试、乡规民约、政府表彰等形式结合，移风易俗，深入社会，深入基层；树立统治阶级倡导的价值观、义利观，建立封建社会秩序。如朱元璋颁布《圣谕六言》，以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等为中心，拉开了明清两代礼乐教化的序幕。历史上的许多“循吏”，大都善于推行礼乐教化。“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治天下”必须重视礼乐教化，汉儒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对于我国封建社会的长久延续、长治久安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礼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体现。历史表明，无论政权的延续或更替，还是汉族抑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只要重视礼乐教化，其政权就会兴、社会就会相对稳定；而蔑视或践踏礼乐，则适得其反。但“礼，时为大”，时势不同，具体的礼乐制度和教化措施也需做相应的调整。

“治安中国”与“华夷一家”

边疆与民族能否得到治理，是大一统国家能否安定的重要因素。与历史上其他国家不同，17世纪以前，我国较长期而稳定地维持了幅员广阔的边疆，形成了多民族不断融合、共同

发展的局面，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边疆民族治理思想与措施。

大一统观念是维护我国历史疆域完整的文化驱动力。但起源于先秦的“五服”“九服”及以后的“藩属”概念，在边疆治理上并不强调边疆与内地的“同质”化而重视“差序”化治理；在边疆治理理念上强调“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的内政主体思想，并在巩固内政与开拓边疆之间寻求平衡点，也由此形成了积极温和、富有弹性的边疆开拓政策。在民族观念上，虽然“华夷之辨”思潮长期存在，但自先秦开始的文化认同高于血缘认同的认识，积极促成了“华夷一家”思想的形成。如唐太宗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雍正称“天下一统，华夷一家”，都是典型。这种强调融合而非差别的民族观念，有助于各民族间的认同。

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历代形成了边疆与民族治理的许多具体措施。

边疆开拓与移民实边。对于边疆既要“以德怀之”，也要“恩威并施”。西汉武帝时，鉴于“边境强则中国安”，决定出兵匈奴。正是由于“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才奠定了历史上西北的政治格局。唐朝击败势力强大的突厥，保障了西北各族的安定和丝绸之路的畅通。明朝发动“麓川之役”，巩固了西南边疆，奠定了西南边疆的格局。清朝坚决镇压新疆、青海等地的叛乱，才保住我国西部疆域不被分裂。为了巩固边疆，自秦汉后，历代王朝采取徙民实边、屯田等方式，巩固边疆，使汉族与少数民族杂

居，促进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

分而治之与政教分离。“散则易制，得并为一，则势专难图。”西汉对匈奴、明朝对青藏、清朝对蒙古势力，采取的都是分而治之政策。我国历史上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宗教多予尊重，并援引宗教上层人士进入政权，以提升中央政权在边疆地区的威望，加强对其控制。但另一方面，又采取多种方式，逐渐削弱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如明朝在藏族地区采取“多封众建”策略。清朝由于统治疆域更为广大，尤为注重宗教因素在边疆管理中的作用。如在西藏分别册封达赖、班禅，分管前藏、后藏。在蒙古地区，册封哲布尊丹巴。历代坚持“以政驭教，决不以教驭政”，政权高于教权的基本原则。

因俗而治与移风易俗。因俗而治是我国古代治理边疆民族政策的重要原则。西汉在边疆虽设郡，但“以其故俗治”。唐代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羁縻州、县，源于元代并被明清继承的土司制度，都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因俗而治。在因俗而治的同时，我国古代政权又竭力加以监督，如西汉的西域都护府、唐朝都督府设置都是如此。而对条件成熟的地区，便将其纳入直接管理。明清两朝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维持了西南边疆的长期安定。但完全因俗而治并不利于民族融合与进步，历史上中原文明要高于周边是历史事实。因此，历代王朝大多鼓励向周边民族传播文化，在考试、用人上，采取不同录取比例的政策倾斜，吸收其优秀人才进入统治阶层。文化认同是民族融合与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历史上民族融合、民族关系处理得比较好的时期，并不仅仅取决于中原王朝的政策，也往往是各少数民族接受中原文明程度比较高的时期。

我国历史上的边疆民族治理在17世纪以前基本是以“内边”为主，边疆治理与境内民族治理相互交织。17世纪以后，外来侵略日益严重，“外边”忧患日益突出，明清两朝统治者在这个问题上不思进取，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这是近代以来丧权辱国历史形成的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治理思想

短装束身 来去如风

□袁臻睿

晋楚鄢陵之战中，晋厉公战车深陷泥沼，这个教训，显露出早期战车的笨拙。由此，列国开动脑筋，采用更加有效的方式来改变它。这促使一个新的兵种诞生了。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率先实行军事改革，令部属短装束身，穿胡服、练骑射，史称“胡服骑射”。据说不到一年，赵武灵王就训练出一支强悍的骑兵队伍。从此，车兵的地位逐渐被骑兵取代。

但这只是传统说法，那种认为中国古代骑术出现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是“介绍骑术进入华夏第一人”的说法，其实并不确切。依据对甲骨文中的“先马”和“马射”等辞例的研究，有史学家认为，中国的骑射早在殷商时代就已经产生。《诗经·大雅·绵》中的“走马”一词，据顾炎武解释应为“单骑之称”，并说西周时期仍保持着殷商时代单骑的传统。先秦史料中，“骑”字最早出现在《墨子》和《吴子》诸书上。

吴起讲，“千乘万骑，兼之徒步”“分车列骑”；孙臆则讲“用骑十利”。但在中原大地大规模使用骑兵部队作战，形成“车驰卒奔”“剽疾迅猛”的战斗场面，应该是在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前后。

为了适应骑兵部队作战的需要，战国时靠近北方的诸国一方面从游牧民族那里引进良马；另一方面，北边的燕、赵地区，特别是西方的秦国也都自己开辟了牧马场，大规模牧养马匹。

那时的诸侯将帅们坚持“一切为了打得赢”的战争指导思想，不仅使养马技术在当时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批高超的养马专家，写出了一批养马学专著，而且使骑术和马具也有所发展。

长久以来，对于“马具”这个重要的骑兵装备，史书中鲜见记载，而



邯郸博物馆陈列的古墓壁画养马人和骑马

在考古发掘中也不多见。值得庆幸的是前些年，在新疆都善，这个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处，一座叫作苏贝希的墓葬中，出土了一具大约在公元前纪年以前生产的马具，这件文物的出土为古代骑兵部队的发展做出了最翔实的注释。

新疆都善苏贝希墓葬出土的这套马具，包括衔、镮、鞵、鞞。鞵为红毛毡，鞵上置鞍。鞍表面为皮革，内里填充毛质物，表面有金属钉，打造技艺相当精湛，其形态与金村铜镜图纹上的马鞍颇为相似。它让人们看到当时中国东西部骑兵的马具，竟然只有低平的软马鞍而无镫，显得简单而实用。专家推断，中国马具马鞍的起源，绝对应该早于公元纪年前后。因当时西域各国的发达程度，肯定远不及中原和匈奴地区。只是由于多种原因所致，没有条件让那个时代更为先进的中原马具保存下来。而都善苏贝希墓葬中的这套马具之所以能够较好地保存下来，可能与新疆地区干燥少雨的气候条件有关。

骑兵部队的发展，在秦始皇一统六国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骄横的秦始皇对车骑兵部队的卓著功勋也是引以为傲的，以致在他驾崩后的

陵墓里，依然保留着秦帝国浩浩荡荡、阵容强大的车兵与步兵营垒。

步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气势磅礴的一号坑，内有兵俑、战马6000余尊，战车50余乘，完全是把一个古代步兵骑兵与车兵联合编组的庞大方阵呈现于游客面前。形制特殊的二号坑内含四大方阵，即弓弩方阵、车兵方阵、骑兵方阵和混编方阵；出土的兵俑、陶马1600余尊。呈“凹”字形的三号坑更是不同凡响。凹处置有四马系驾战车一乘，两侧各为独立的南北厢房，坑中兵俑均着重装铠甲，且相向而立；表明它就是秦军的将帅大帐——战役指挥部。这些都极具象征力地表现出当年秦帝国强大的军事阵容和骁勇的战斗力。

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站在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观”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前，看到以武士、良驹、利器为战斗阵容的威武雄壮的编队列伍，演兵布阵，怎能不由衷地发出惊叹与赞美呢？正是在那“秦皇终一统”的年代，中国一马当先地引领着当时世界军事装备潮流浩荡前行。

历史散叶

使，故能平一海内”。刘邦是政治家，他的软实力首推知人善任。因为知人善任，故能群策群力，因为群策群力，方显刘邦的领袖魅力。

知人善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刘邦的知人善任关键在于两点。

首先是绝对的倚重敬重。萧何慧眼识韩信，向刘邦大力举荐，萧何说：“大王您如果只想当个汉王，自然没有用得着韩信的地方；倘若您要争夺天下，除了韩信，就没有可与您图谋大业的人了。只看您作哪种抉择了！”刘邦说：“我也是想要东进的，怎么能够忧郁沉闷地老待在这里呀！”萧何道：“如果您决计向东发展，那么能任用韩信，韩信就会留下来，如若不能使用他，他终究还是要逃跑的。”刘邦说：“那我就看在你的面子上任他做将军吧。”萧何说：“即便是做将军，韩信也不会留下来的。”刘邦道：“那就任他为大将军吧。”这才有了后来的韩信登坛拜将。刘邦重用韩信，才得以从汉中突入关中，进而东出函谷关，与项羽逐鹿中原。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韩信担当一面，在北方战场消灭了项羽的盟友赵国大军和项羽手下大将吕纯率的项羽最为倚重的主力军。项羽眼看实力不济，派武陟前去游说韩信背汉。韩信说：“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我们常说将心比心，刘邦厚待韩信，韩信则以忠诚回报。

其次是对人才使用的清晰定位。就拿陈平来说，这个人对刘邦的事业非常重要。当他从项羽阵营前来投奔刘邦之后，刘邦跟他一交谈就非常欣赏，当即任命他“典护军”。就是让陈平负责督察诸将。刘邦对陈平极为恩宠，让他出入和自己坐同一辆车。将领们因不服气都喧哗鼓噪起来，说：“大王您得到一名楚军的逃兵才一天，还不了解他本领的高低，就与

知人善任 群策群力

刘邦的成功之道（一）

□丁万明

他同乘一辆车子，且还反倒让他来监护我们这些有资历的老将！”刘邦听到这种种非议后，却更加厚待陈平了。陈平备受争议，但他是刘邦的安全主管，刘邦让他干的就是收集情报、策反敌人、督察内部的重要工作，史书上说他为刘邦“凡六出奇计”，功勋卓著。这就是刘邦用人得当的具体体现。

